

# 家庭支持对农民创业动机的影响研究

## ——兼论人缘关系的替代作用

董 静 赵 策

**【摘 要】**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农村地区,家庭支持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巨大。文章以中国“千村调查”所得4 531个农民创业者样本为基础,从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出发,研究家庭对农民创业动机的影响,考察外部人缘关系所发挥的替代作用,并进一步分析家庭支持、人缘关系对不同性别农民创业者创业动机的影响。研究表明:(1)家庭经济支持力度越大,农民选择生存型创业的倾向越低,选择机会型、成就型创业的倾向越高。(2)家庭情感支持力度越大,农民选择成就型创业的倾向越高。(3)农民创业者的外部人缘关系与家庭支持存在一定替代性,即人缘关系越广,家庭支持对创业动机选择的影响越小。(4)与男性创业者相比,农村女性生存型创业比例更高,得到的家庭经济支持显著小于男性;在男性创业者中,丰富的外部人缘关系主要替代家庭经济支持;在女性创业者中,外部人缘关系主要替代家庭情感支持。

**【关键词】**农民创业 创业动机 家庭支持 人缘关系 性别差异

**【作 者】**董 静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赵 策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 一、引 言

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大大调动了农民创业的积极性。农民创业对于减贫增收、带动就业、解决“三农”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鲜有研究深入分析家庭对农民创业动机的影响。

家庭对个体行为的影响通常具有隐蔽性和灵活性,但其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创业者的家庭内外社会关系通常以榜样、情感、资源等多种形式影响创业全过程(Meek等,2010)。与城市相比,中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信息相对闭塞,融资渠道较窄,基础设施条件较差,人力资本和专业知识的匮乏,因此,农民创业可能更加依赖家庭内外的社会关系。马光荣、杨恩艳(2011)研究发现,拥有更多社会关系的农民有更多的借贷渠道,同时社会关系可以为创业者提供信息、雇员、客户机会、情感支持等(Welter,2011;陈

文超等,2014)。但是,浓厚的人情文化和社会关系也会加重农民创业者的精神负担与经济负担(董静等,2018)。

本文重点研究处于农村环境中的创业者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对其创业动机的影响,着重关注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与农村创业者创业动机的关系,以及外部人缘关系对上述关系的影响。此外,本文特别关注创业动机的性别差异。其原因有三:一是中国创业者男女比例不均衡,女性创业者明显少于男性,并且中国自古有“家和万事兴”的传统观念,家庭是影响女性创业的重要因素;二是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较为严重,一些村落文化不支持女性抛头露面,村庄中的人缘关系可能会阻碍女性创业;三是关于女性创业的研究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女性的风险承担能力、体力、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较弱,在创业中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居凌云、梅强,2014)。但也有研究认为,女性富有同情心、善于倾听、期待合作,因而更有创业优势(Dahalan等,2013;许艳丽、郭达,2015)。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农民创业者家庭因素如何影响其创业动机?不同维度的家庭支持(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对农民创业动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2)以人缘关系为代表的外部社会资本对家庭支持与创业动机之间的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3)在中国农村情境下,家庭支持、人缘关系、创业动机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拓展了对创业动机的家庭影响因素的研究,从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两个维度探讨家庭对不同创业动机的影响。(2)聚焦中国农村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人缘关系这一重要外部社会关系进行探析,研究人缘关系在创业动机选择中对家庭支持的影响。(3)从性别角度分析家庭支持、人缘关系与创业动机之间的作用差异,对深入理解农村创业中的性别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4)以覆盖全国的4 531份农村创业者调查问卷为基础展开的实证研究,填补了本领域大样本研究的空白。

##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根据文献梳理和对农民创业活动的实地调查,本文将农民创业动机分为三类:一是生存型创业(Schoar,2010),表现为外部驱动及反应式创业。例如,种地收入支付不了家庭支出,没有更好的职业选择,为了生存而选择创业。二是机会型创业(Ardichvili等,2003),表现为发现了商机,主动选择创业。三是成就型创业(Schoar,2010),表现为较强的内部需求,希望成就一番事业,想要自己当老板。生存型创业总体属于迫于无奈的推动式创业,机会型和成就型则更多体现为创业吸引力拉动型创业。

### (一) 家庭支持与创业动机

相对于城市地区,农村环境下“家”的作用更为突出。家庭固有的血缘、情感形成的

内部凝聚力有助于农民应对创业风险。而农村基础设施、融资渠道、知识技能等的缺乏也导致农民创业者更加依赖家庭及其嵌入的社会环境。如果当地有支持创业的社会文化氛围,创业会受到更多关注,更多人会考虑创业。然而,即使选择了创业,想要保持旺盛的创业动力还需要周围人的鼓励和支持。创业者所具有的社会关系可以分为强、弱两类。强关系在提供资源方面优势突出,弱关系在提供信息和机会方面更有优势(黄洁、买忆媛,2011)。农民创业者所具有的外部人缘关系具有弱关系的特点,而家庭是典型的强关系。这两种关系极大地影响农村创业者的创业动机。Moore(1990)将创建企业需要得到的家庭支持分为物质和情感两个层面,本文也遵照这一分类。

### 1. 家庭经济支持与农民创业动机

家庭经济支持是农民创业初期的重要财务支撑。由于农村地区金融约束程度较高,农民创业更加依赖非正式融资渠道,家人则是该渠道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农民创业通常以涉农生产为主,盈利状况受市场环境、自然条件乃至农业生产周期的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在农村很难找到适当的担保机构,而且农民创业者缺乏能够证明其还款能力的有效抵押物,在信息不对称及潜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制约下,农村地区的正式融资体系普遍发展滞后。与此同时,农民创业者自身金融知识不足,感知的融资交易成本高,导致农民创业者对申请银行贷款等缺乏信心,容易主动退出正规融资渠道。相比之下,家庭经济支持具有正规融资渠道无法比拟的优势。信息获取方面,由于地理临近性和密切的家人关系使创业者家庭对创业项目十分了解。契约执行方面,家庭成员之间拥有共同的声誉、利益和道德规范,方便监督,执行效率高。交易成本和规则方面,家庭融资的操作程序简单,规则灵活(归还日期、利率可能口头协定即可),交易成本低。因此,家庭作为非正规融资渠道,在信息甄别、审查监督、交易成本方面优势明显,是支持农民创业的首要资金来源。

对创业动机的研究,最有影响力的是推拉理论(Zmud,1984)。“拉”强调内在激励是影响创业动力的主要动力,“推”强调外在经济利益是从事创业的驱动力。窦大海、罗瑾琰(2011)认为,创业动机来自“经济需求的激励”和“社会需求的激励”,经济需求是指温饱、安全等保障性需求,社会需求是指探索新的生活方式、谋求更大独立、成就一番事业、得到他人尊重等。张玉利等(2008)研究发现,创业动机与需求层次紧密相关,收入水平高的创业者需求层次也会相应提高。当农民创业者家庭经济情况较差时,创业者更加关注如何获取经济回报,尽快脱离贫困、改善家庭生活现状。因此,当家庭能够给予创业的经济支持较少时,农民创业者更可能选择生存型创业。当农民创业者不再为温饱担忧时,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考虑是否有好的创业机会,进行更多思考和选择。有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状况的提升,创业动机会变得更为复杂,社会性动机有所增强。也就是说,当农民创业者的经济压力较小时,其创业更多是为了捕捉机会、得到认可,乃至实现

个人成就。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家庭经济支持力度越大,农民创业者选择生存型创业的可能性越小,选择机会型、成就型创业的可能性越大。

## 2. 家庭情感支持与农民创业动机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关系型社会(张峰等,2017),自古就有“家和万事兴”的观念,与推崇个人主义的西方创业者相比,中国创业者更加重视家庭成员关系的和睦。与城市地区相比,农村社会交往的家庭化程度更高,宗族等传统观念和乡土文化浓厚,因而家庭对创业者的情感支持更为重要。杨婵等(2017)发现,农民会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其家庭结构做出创业选择,家庭氛围、亲子关系、教育方式等会直接影响家庭成员的职业选择和相互之间的支持。

家庭情感支持对于农民创业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家庭情感支持可以为创业者提供心理资本。这种心理资本能使创业者以平和的态度应对挑战,乐观向上,坚定信念。有研究发现,来自配偶的情感支持能正向预测员工的身体状况和工作满意度(Karatepe等,2007)。(2)家庭情感支持有利于解决创业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冲突。如时间冲突,创业初期时间和精力可能主要集中在创业项目上,对家人的关心照顾不周;压力冲突,创业过程中经历紧张、焦躁、疲劳等状态,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创业者对待家人或家庭事务的态度;行为冲突,创业者因创业而无法满足家人对于其家庭角色的期望时,会产生角色间的矛盾冲突。这时家庭若能提供情感支持,则可以为创业者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有助于化解和避免矛盾,保证创业者全身心投入创业,进而促使创业活动顺利进行。在生存型、机会型和成就型3种创业动机中,成就型创业对创业者全身心投入的要求更高,对家庭情感支持的需要也更大。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家庭情感支持力度越大,农民创业者选择成就型创业的可能性越大。

## (二) 人缘关系对家庭支持作用的影响

创业者处于复杂的人缘关系网络中。一个拥有丰富人缘关系的创业者,更能调动社会资源。人缘关系越丰富的农民,其能力和素质也相对较高,具有资源优势,在村落中发挥着“领导、管理、整合”的作用,具有不可忽视的领导力。费孝通(2008)基于“农村差序”格局的研究指出,农村人缘关系的广度和密度直接影响个人的信用和资源获取能力,而这些通过长期积累形成的人缘关系有助于农民创业者在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发挥社会资本的资源配置替代机制和创业资源吸纳作用(李树、陈刚,2012)。也就是说,丰富的人缘关系可以帮助创业者获取资金、技术、人力等资源;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帮助创业者快速准确地找到所需资源;提高创业者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预测能力,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人缘关系还有助于为农民创业者的资产提供非正式保护,弥补农村地区的制度缺陷,减少创业的风险及不确定性。人缘关系衍生出的“光环效应”、“信号效应”,使农民创业者更容易得到他人认可,进而更容易获得订单或政府补贴等。总之,丰富的人缘



关系有利于农村创业者获取信息资源、财务资源、情感支持,并且有助于提升创业者整合、吸收和利用外部资源的能力,进而为顺利创业提供保障(Casson 等,2007)。

从创业的角度看,人缘关系对家庭支持作用的影响存在两面性。一是替代性。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内外部资源常常表现为成本权衡取舍,因而存在替代关系(Cassiman 等,2006)。也就是说,外部人缘关系能替代内部家庭支持的作用。例如,王超恩等(2015)从社会资本视角考察中国农民工创业融资方式时发现,基于家庭禀赋的内源性融资与基于地缘衍生出的外源性融资之间具有较强的替代性。二是互补性。资源基础理论强调内外部资源在长期动态变化中存在互补关系(Sun 等,2017)。也就是说,人缘关系能强化家庭支持的作用。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先赋与自致两类(齐小兵,2014),先赋类社会资本主要指依赖血缘的家庭关系资本,是去阶层化关系的代表(梁漱溟,1987)。个体不仅能继承家庭财富,还能继承家庭关系。例如,社会精英家庭的子女先天比人力残缺家庭的子女拥有更优质的社会资源(杨婵等,2018)。人缘关系作为自致类社会资本的代表,可能基于家庭继承而产生,同时更需要创业者后天营造和维护。家庭资源的多寡决定了创业者基于先赋获得的人缘关系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人缘关系可能通过婚姻等途径转化为家庭关系。人缘关系与家庭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互动和转化。

虽然替代、互补作用并存,但在本文的研究主题下,人缘关系对家庭支持的替代作用可能大于互补作用,主要基于以下原因:(1)环境局限。中国农村地区的小农经济特点,使基于家庭背景产生的先赋性人缘关系不仅十分有限而且差别较小。(2)认知局限。农村地区人群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信息相对闭塞。受农耕文明和“士农工商”传统观念的影响,当丰富的人缘关系能提供其他职业选择时,农村家庭更期望家庭成员有稳定工作而不是创业。(3)时间局限。从长期来看,创业过程离不开家庭和外部社会资本的共同支持,但从创业动机产生的特定时点看,资源难以在短期内互动和转化,因而家庭关系与外部人缘关系存在替代性。因此,本文认为,虽然家庭对农民创业者的创业动机有显著影响,但是拥有丰富人缘关系的农民创业者会减少对家庭支持的依赖,也就是说,创业者的人缘关系会减弱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对其创业动机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创业者人缘关系与家庭支持存在替代性,即人缘关系越广,家庭支持对创业动机选择的影响越小。

### (三) 性别差异的影响

根据社会性别理论,男女两性存在生物学差异,但女性扮演的社会角色并非都由其生理结构决定,更多是受社会文化规范的影响。那么,在中国农村,创业者的性别是否会影响其创业动机?内外部因素又在其中发挥着何种作用?

本文认为,性别会影响农村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并且家庭支持和人缘关系对创业动机的影响也存在性别差异。原因如下:(1)农村地区受封建传统和社会习俗的影响更大,难以摆脱男性主导、男尊女卑思想,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差、信息相对闭塞、村民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地区,女性社会地位普遍较低。在农村的传统思想中,创业这类抛头露面的事情应该由男性主导。农村女性如果主动寻求社会资源积极创业,经常会被议论为“不安分守己”。因而家庭对女性创业的支持比较有限。(2)农村女性的社会角色常常被定位在家庭中,是家务琐事的主要负责人。由于男性和女性存在明显的生理差异,农村女性一般在精力旺盛的黄金年龄承担养儿育女、照顾全家老少的责任,这限制了她们外出创业的精力和时间。因而,如果要创业,往往是迫于家庭生计的被动的生存型创业。(3)农村女性受教育的机会较少、受教育程度较低,限制了农村女性的能力、知识面和视野,使其难以接触或接受新事物,从事机会型创业和成就型创业的概率较低。(4)受社会角色定位和能力的约束,农村女性的人缘关系通常会比男性狭窄。因而,人缘关系对农村女性创业的支持比较有限。因此,本文提出假设4:家庭支持、人缘关系、创业动机之间的关系因农民创业者的性别而存在差异。

### 三、研究设计

#### (一) 研究样本

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项目自2008年开始,每年对中国农村发展现状开展不同主题的调研。2016年“千村调查”的主题为“中国农村创业现状调查”。在国内外顶尖学者的协助下,“千村调查”项目组设计了针对镇长、村主任、村委、创业者、非创业者5个群体的调查问卷。调研过程采用随机抽样定点调查为主、学生暑期返乡调查为辅的方式进行。2016年6月~8月,共有30余名教师和2188名学生参与实地调查。问卷调查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这次调查覆盖了全国1500多个村寨(其中包括22个省市区的30个定点调查县),完成问卷30000余份,其中农民创业者问卷共4925份。在剔除缺失关键变量、缺失数据单位、数据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样本后,最终得到4531份有效样本。样本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样本中女性创业者占23%;农民创业者的学历普遍较低,34%为高中和中专,28%为初中及以下;60%的创业者年龄在40~60岁。农民创业的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员工人数5人及以下的占62%;与中部和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农民创业者数量更多;创业主要集中在农业和商业领域。

#### (二) 变量及其测度

本文因变量为创业动机。生存型创业动机对应于创业者填答“没有更好的工作选

择;为了改善生活”这两个选项的情况;机会型创业动机对应于选项“发现了创业机会”;成就型创业动机对应于创业者填答“成就一番事业;寻求更大的独立”这两个选项。

本文自变量为家庭支持,包括:(1)家庭经济支持,根据“您创业的资金

来源渠道有哪些?”题项中个人储蓄金额加家人支持金额的数值进行衡量。(2)家庭情感支持,根据创业者填写的“家庭情感支持”获得,下设3个题项:“因为创业导致我的生活方式需要随之改变时,家人能够理解并接受这种改变”;“当我遇到创业中的挫折而情绪发生变化时,家人能宽容并且安慰我”;“配偶会从精神上支持我的事业,经常给予我鼓励”。题项设计参考 Powell 等(2013)和 Arregle 等(2015)的研究。每个题项均采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测度,1~6 分别代表“非常不同意”、“基本不同意”、“不同意”、“同意”、“基本同意”、“非常同意”。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各条目之间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 0.763),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合成综合反映农民创业者家庭情感支持的连续变量。

本文调节变量为人缘关系。对农村地区人缘关系的测度,常用指标有“经常联系的亲友人数”、“礼金支出”、“通信费用”、“电话联系人”等(乔丹等,2017)。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测度的准确性,以及中国农村地区手机使用的广泛性,本文采用农村创业者“手机联系人的数量”来衡量其人缘关系。

### (三) 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总体来看,农民创业者出于生存型创业动机的比例最高(57.2%),25.3%的农民创业者选择机会型创业,17.5%的农民创业者选

表 1 样本基本特征分布状况表

分类指标	频数	有效比例(%)	分类指标	频数	有效比例(%)
性别			学历		
男	3480	77	初中及以下	1258	28
女	1051	23	高中、中专	1541	34
年龄分组			大专	868	19
30 岁以下	513	11	大学本科	551	12
31~40 岁	967	21	硕士及以上	313	7
41~50 岁	1793	40	企业规模(员工人数)		
51~60 岁	889	20	5 人及以下	2809	62
61~70 岁	271	6	5~10 人	680	15
70 岁以上	98	2	10~15 人	317	7
家庭社会地位			15 人以上	725	16
下层	227	5	行业分布		
中层	2311	51	农业及相关行业	1275	28
上层	1994	44	工业、建筑及运输业	1012	22
地域分布			商业	1181	26
东部地区	3398	75	服务业	867	20
中部地区	906	20	其他	196	4
西部地区	227	5			

表 2 变量测度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属性	变 量 定 义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生存型	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为了改善生活	0.572	1	0.496	0	1
机会型	发现了新的机会	0.253	0	0.432	0	1
成就型	成就一番事业;寻求更大的独立	0.175	0	0.371	0	1
解释变量						
家庭经济支持	创业资金来源渠道:个人储蓄+家人支持 (单位:万元)	30.699	10	81.424	0	1200
家庭情感支持	由 3 个题项经过主成分分析得出	8.244	8.213	21.479	1.730	10.378
调节变量						
人缘关系	手机中联系人数量	183.680	140	155.010	0	800
部分控制变量						
年龄	年龄	44.650	45	10.120	19	80
担任干部	是 1;否 0	0.118	0	0.323	0	1
参加培训	是 1;否 0	0.277	0	0.448	0	1
参军经历	是 1;否 0	0.068	0	0.251	0	1
正在创业的人员	正在创业的家人数量+正在创业的亲朋 数量	3.770	2	5.602	0	33
外出打工经历	是 1;否 0	0.068	0	0.251	0	1
家中老人子女数量	以实际调研数据为主	2.871	3	1.321	0	9

择成就型创业。家庭对创业的经济支持存在较大差距。以手机联系人测度的人缘关系宽度,均值约为 184 个。接受调查的农民创业者的平均年龄为 44.65 岁。

四、实证结果

(一) 主回归分析

为确保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进行了以下数据处理:(1)对自变量、调节变量进行缩尾处理。(2)对调节变量与自变量的交互项进行去中心化处理。(3)对家庭经济支持、人缘关系、创业者年龄、家中正在创业的亲友数量等数值取对数值。表 3、表 4、表 5 分别呈现了家庭支持、人缘关系及其交互作用对农村创业者生存型创业动机、机会型创业动机和成就型创业动机的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其中,模型 1、模型 7、模型 13 中仅加入控制变量,模型 2、模型 8、模型 14 加入家庭经济支持和家庭情感支持变量,模型 3、模型 9、模型 15 中加入人缘关系变量,模型 4、模型 10、模型 16 和模型 5、模型 11、模型 17 分别考察人缘关系对家庭经济支持及家庭情感支持的调节作用,模型 6、模型 12、模型 18 中加入所有自变量、调节变量与控制变量。

1. 家庭支持与农民创业动机

模型 2、模型 8 和模型 14 的结果显示,家庭经济支持显著负向作用于生存型创业



动机( $\beta=-0.279, p<0.01$ ), 显著正向作用于机会型创业动机( $\beta=0.149, p<0.01$ )和成就型创业动机( $\beta=0.263, p<0.01$ )。家庭经济支持力度越大, 农民创业者越倾向于选择机会型或者成就型创业, 且越不倾向于选择生存型创业。或者说, 选择生存型创业的农民多处于家庭难以提供较多经济支持的状况。假设 1 得到验证。回归结果还显示, 家庭情感支持显著正向作用于成就型创业动机( $\beta=0.079, p<0.05$ )。即家庭情感支持力度越大, 农民创业者选择成就型创业动机的可能性更高。这说明, 与其他创业动机相比, 成就型创

表 3 家庭支持、人缘关系与农民生存型创业动机的 logit 回归结果

变 量	生 存 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家庭经济支持		-0.279*** (-9.32)	-0.260*** (-8.42)	-0.527*** (-7.45)	-0.255*** (-8.25)	-0.498*** (-6.91)
家庭情感支持		-0.039 (-1.43)	-0.041 (-1.48)	-0.036 (-1.30)	-0.122*** (-3.08)	-0.098** (-2.40)
人缘关系			-0.119*** (-2.86)	-0.303*** (-5.04)	-0.811*** (-3.28)	-0.807*** (-3.19)
经济支持×人缘关系				0.188*** (4.24)		0.171*** (3.77)
情感支持×人缘关系					0.629*** (2.85)	0.475** (2.06)
性别	-0.296*** (-3.18)	-0.229** (-2.29)	-0.204** (-2.00)	-0.195* (-1.91)	-0.187* (-1.83)	-0.184* (-1.79)
年龄	0.417** (2.44)	0.398** (2.19)	0.332* (1.79)	0.362* (1.94)	0.325* (1.75)	0.353* (1.89)
正在创业的人员	-0.202*** (-5.68)	-0.166*** (-4.34)	-0.158*** (-4.00)	-0.153*** (-3.85)	-0.153*** (-3.87)	-0.150*** (-3.77)
担任过干部	-0.140 (-1.24)	-0.122 (-1.01)	-0.129 (-1.05)	-0.124 (-1.00)	-0.123 (-0.99)	-0.120 (-0.96)
参军经历	-0.342** (-2.23)	-0.370** (-2.27)	-0.418** (-2.51)	-0.398** (-2.39)	-0.411** (-2.47)	-0.396** (-2.38)
参加过培训	-0.200** (2.41)	-0.174** (1.96)	-0.140 (1.56)	-0.129 (1.43)	-0.136 (1.51)	-0.127 (1.40)
外出打工经历	-0.052 (-0.67)	0.006 (0.07)	-0.003 (-0.04)	-0.003 (-0.03)	-0.001 (-0.01)	-0.001 (-0.01)
家中老人子女数量	-0.014 (-0.14)	0.017 (0.17)	0.056 (0.55)	0.051 (0.49)	0.054 (0.52)	0.050 (0.48)
LR	183.33	254.16	255.21	272.92	263.03	277.06
Pseudo R <sup>2</sup>	0.040	0.062	0.064	0.068	0.066	0.069
样本量	3317	2996	2928	2928	2928	2928

注:控制了学历、地区和家庭社会地位变量。\* $p<0.10$ , \*\* $p<0.05$ , \*\*\* $p<0.01$ 。

表 4 家庭支持、人缘关系与农民机会型创业动机的 logit 回归结果

变 量	机 会 型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家庭经济支持		0.149*** (4.60)	0.142*** (4.22)	0.262*** (3.39)	0.140*** (4.15)	0.250*** (3.17)
家庭情感支持		-0.015 (-0.48)	-0.008 (-0.27)	-0.010 (-0.34)	0.024 (0.55)	0.013 (0.28)
人缘关系			0.0270 (0.58)	0.112* (1.67)	0.306 (1.11)	0.300 (1.09)
经济支持×人缘关系				-0.086* (-1.74)		-0.079 (-1.56)
情感支持×人缘关系					-0.253 (-1.04)	-0.177 (-0.71)
性别	0.286*** (2.63)	0.264** (2.27)	0.267** (2.25)	0.263** (2.22)	0.260** (2.19)	0.258** (2.18)
年龄	-0.071 (-0.37)	0.041 (0.20)	0.072 (0.34)	0.059 (0.28)	0.077 (0.37)	0.064 (0.30)
正在创业的人员	0.110*** (2.76)	0.080* (1.88)	0.086** (1.97)	0.084* (1.91)	0.084* (1.93)	0.083* (1.88)
担任过干部	-0.005 (-0.04)	0.020 (0.15)	0.011 (0.08)	0.008 (0.06)	0.008 (0.06)	0.007 (0.05)
参军经历	0.176 (1.06)	0.144 (0.82)	0.157 (0.88)	0.150 (0.84)	0.155 (0.87)	0.149 (0.84)
参加过培训	0.058 (-0.62)	0.080 (-0.80)	0.070 (-0.69)	0.065 (-0.64)	0.068 (-0.68)	0.064 (-0.64)
外出打工经历	0.139 (1.57)	0.098 (1.06)	0.108 (1.15)	0.107 (1.14)	0.107 (1.14)	0.107 (1.14)
家中老人子女数量	-0.030 (-0.29)	-0.068 (-0.61)	-0.057 (-0.50)	-0.054 (-0.47)	-0.056 (-0.49)	-0.053 (-0.46)
LR	59.91	74.51	74.88	77.77	75.90	78.25
Pseudo R <sup>2</sup>	0.016	0.023	0.023	0.024	0.023	0.024
样本量	3317	2996	2928	2928	2928	2928

注：同表 3。

业动机对创业者家庭情感支持的需要较大。假设 2 得到验证。

从控制变量看,总体而言,年龄越大的农民越倾向于选择生存型创业;学历较高的农民通常更容易选择机会型、成就型创业;正在创业的亲友数量越多的农民越容易选择机会型或成就型创业;有参军经历的农民更可能选择成就型创业;家庭社会地位越高的农民更有可能选择成就型创业。与中部和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农民选择生存型创业的可能性更高,选择机会型创业的可能性更低,间接说明西部农村地区的创业机会较少。

表 5 家庭支持、人缘关系与农民成就型创业动机的 logit 回归结果

变 量	成 就 型					
	模型 13	模型 14	模型 15	模型 16	模型 17	模型 18
家庭经济支持		0.263*** (6.89)	0.236*** (6.01)	0.429*** (4.77)	0.232*** (5.91)	0.394*** (4.31)
家庭情感支持		0.079** (2.16)	0.073** (1.96)	0.069* (1.85)	0.166*** (3.14)	0.146*** (2.67)
人缘关系			0.199*** (3.28)	0.333*** (4.13)	0.998*** (2.92)	0.966*** (2.80)
经济支持 × 人缘关系				-0.141** (-2.43)		-0.119** (-2.00)
情感支持 × 人缘关系					-0.739** (-2.44)	-0.602* (-1.91)
性别	0.241* (1.87)	0.182 (1.30)	0.133 (0.93)	0.129 (0.90)	0.115 (0.81)	0.114 (0.80)
年龄	-0.867*** (-3.90)	-0.964*** (-4.06)	-0.909*** (-3.73)	-0.935*** (-3.82)	-0.915*** (-3.74)	-0.935*** (-3.82)
正在创业的人员	0.188*** (4.14)	0.151*** (3.07)	0.122** (2.40)	0.119** (2.34)	0.118** (2.32)	0.116** (2.28)
担任过干部	0.168 (1.17)	0.129 (0.83)	0.155 (0.97)	0.153 (0.96)	0.147 (0.92)	0.146 (0.92)
参军经历	0.246 (1.33)	0.292 (1.50)	0.372* (1.90)	0.361* (1.85)	0.370* (1.89)	0.363* (1.85)
参加过培训	0.257** (-2.43)	0.233** (-2.07)	0.189 (-1.64)	0.183 (-1.59)	0.186 (-1.61)	0.181 (-1.57)
外出打工经历	-0.129 (-1.28)	-0.201* (-1.88)	-0.212* (-1.96)	-0.214** (-1.96)	-0.215** (-1.98)	-0.216** (-1.98)
家中老人子女数量	0.198 (1.59)	0.155 (1.15)	0.101 (0.74)	0.107 (0.78)	0.105 (0.77)	0.109 (0.79)
LR	129.02	169.08	174.08	179.49	178.94	182.66
Pseudo R <sup>2</sup>	0.044	0.064	0.067	0.070	0.069	0.071
样本量	3317	2996	2928	2928	2928	2928

注：同表 3。

2. 人缘关系的调节作用分析

从模型 3、模型 9 和模型 15 可以看出，人缘关系越宽广的农民创业者越有可能选择成就型创业，而选择生存型创业的农民往往人缘关系有限。

模型 4、模型 10 和模型 16 的结果显示：(1)就生存型创业动机而言，人缘关系与家庭经济支持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 $\beta=0.188, p<0.01$ )，表明随着农民人缘关系的提高，家庭经济支持与生存型创业动机之间的负向关系减弱。(2)就机会型创业动机而

言,人缘关系与家庭经济支持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beta=-0.086, p<0.1$ ),表明随着农民人缘关系的增强,家庭经济支持与机会型创业动机之间的正向关系减弱。(3)就成就型创业而言,人缘关系与家庭经济支持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 $\beta=-0.141, p<0.05$ ),同样表明随着农民人缘关系的增强,家庭经济支持与成就型创业动机之间正向关系减弱。这说明,人缘关系能够显著调节家庭经济支持与创业动机之间的关系,即外部人缘关系与家庭经济支持存在替代性。外部人缘关系越丰富,家庭经济支持对农民创业动机的影响越弱。

模型 5、模型 11 和模型 17 结果显示:(1)就生存型创业动机而言,人缘关系与家庭情感支持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 $\beta=0.629, p<0.01$ ),表明随着农民人缘关系的增强,家庭情感支持与生存型创业动机之间的负向关系减弱。(2)就机会型创业动机而言,农民人缘关系与家庭情感支持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但不显著。(3)就成就型创业而言,人缘关系与家庭情感支持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beta=-0.739, p<0.05$ ),说明农民人缘关系能显著减弱家庭情感支持对成就型创业动机的正向影响。总体来看,就创业动机选择而言,农民外部人缘关系对其家庭情感支持的作用存在替代性。假设 3 得到验证。

(二) 性别差异分析

1. 性别差异的方差分析

表 6 显示了农民创业者创业动机、家庭支持以及人缘关系的性别组间差异。方差检验结果表明,农村女性创业者选择生存型创业动机的均值为 0.634,高于男性创业者的 0.548,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女性创业者选择机会型和成就型创业动机的比例均低于男性,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创业动机选择方面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表 6 显示,女性在创业过程中得到的家庭经济支持显著低于男性;女性创业者的人缘关系也显著弱于男性。

2. 性别差异的分组回归

本文按性别分组后进行 logit 模型回归分析,发现就农村男性创业者而言,家庭经济支持对其生存型创业动机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其机会型、成就型创业动机有显著正向影响。

家庭情感支持对其生存型创业动机有显著负向影响,对成就型创业动机有显著正向影响。外部人缘关系对家庭经济支持与三

表 6 创业动机、家庭支持与人缘关系的性别组间差异

变 量	女性	男性	差异	t 值
生存型创业动机	0.634(0.018)	0.548(0.009)	0.086(0.020)	4.237***
机会型创业动机	0.209(0.015)	0.254(0.008)	-0.046(0.018)	-2.586***
成就型创业动机	0.128(0.012)	0.176(0.007)	-0.048(0.015)	-3.146***
家庭经济支持	2.028(0.052)	2.452(0.027)	-0.425(0.061)	-6.976***
家庭情感支持	8.216(0.054)	8.242(0.027)	-0.027(0.060)	-0.441
人缘关系	4.526(0.041)	4.905(0.020)	-0.379(0.044)	-8.579***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差。



类创业动机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但对家庭情感支持与创业动机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这说明,对于农村男性创业者,人缘关系主要通过替代家庭经济支持而对其创业动机产生影响。就农村女性创业者而言,家庭经济支持显著负向影响生存型创业动机,显著正向影响成就型创业动机。人缘关系对家庭经济支持与创业动机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调节作用,但对家庭情感支持与生存型创业及成就型创业之间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这说明,对于农村女性创业者,人缘关系主要通过替代家庭情感支持而对其创业动机产生影响。

###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改变样本容量的方法,选取创业时间不早于 2010 年(即创业企业年龄小于 6 岁)的创业者样本,总计 1 341 个,对主回归的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以聚焦严格意义上的创业型企业,从而使研究结论更有针对性。在缩小样本的情况下,实证结果依旧稳健。考虑到创业动机并非独立,而是互斥的三类变量,需要综合考虑。本文进一步建立了多项 Logit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上文并无显著差异。

##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动机分类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社会性别理论,构建了家庭支持、人缘关系与农民创业者创业动机选择的理论分析模型,提出研究假设,并且以全国农村创业者调查数据为样本展开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家庭支持对农民创业动机的选择有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家庭经济支持对生存型动机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对机会型、成就型动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即家庭经济支持力度越大,农民创业者越倾向于选择机会型或者成就型创业,而非生存型创业。换言之,选择生存型创业的农民多处于家庭难以提供较多经济支持的状况。家庭情感支持对农民成就型创业动机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机会型创业动机没有显著影响,而且选择生存型创业的农民很难得到家庭的情感支持。这一发现揭示,成就型动机对家庭情感支持的要求最高。(2)人缘关系与家庭支持存在替代关系。随着农民人缘关系的扩大,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对创业动机选择的影响趋于减弱。这表明,宽广的人缘关系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创业。农民通过提升文化与素质,以德才凝聚人心,能够显著提升创业的质量和效果。(3)家庭支持、人缘关系、创业动机之间的关系因农民创业者性别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农村女性选择生存型创业的比例显著高于男性,得到的家庭经济支持显著低于男性,且人缘关系显著弱于男性;对于农村男性创业者,人缘关系主要通过替代家庭经济支持而对其创业动机产生影响;对于农村女性创业者,人缘关系主要通过替代家庭情感支持而对其创业动机产生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1)农民创业对于“减贫增收”、“精准扶贫”具有重要意义,从鼓励农民创业的角度,政府除了健全和完善正式制度,还需要特别关注农村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对创业动机的影响,可以通过强化宣传、培训等配套政策与服务力度,使更多的农村家庭能够从经济上、情感上给予创业者更多支持。(2)农民创业者依赖家庭支持和外部人缘关系,主要是由于农村地区的创业资源匮乏、制度不完善,从中央到地方应设法加强农村地区的市场化制度建设,为创业者积极对接金融、科技、人才、市场等创业资源。(3)成就型创业更有利于提升创业者个人和家庭的财富水平与幸福感,因此创业者要特别重视家庭关系建设,为创业营造良好的支持环境,以推动创业动机升级。(4)在政府和社会层面,应积极引导大众对女性创业活动的支持和认可。(5)农民创业的动力和效果受创业者自身素质与能力的影响,完善农村地区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建设,是提升农民创业意愿和创业质量的重要途径。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受调查数据的限制(单年的截面数据),无法通过多年观测值对农民创业者的行为作更长期的考察;由于样本缺失值较多,回归分析中的样本数量明显小于总样本量。未来期望通过追踪调查,能够围绕这一主题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

#### 参考文献:

1. 陈文超等(2014):《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2. 董静等(2018):《我国农村创业企业绩效的调查研究——人情关系与“规范化”经验的影响与互动》,《财经研究》,第1期。
3. 窦大海、罗瑾琰(2011):《创业动机的结构分析与理论模型构建》,《管理世界》,第3期。
4. 费孝通(2008):《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
5. 黄洁、买忆媛(2011):《农民创业者初始社会资本对机会识别类型的预测能力研究》,《农业技术经济》,第4期。
6. 居凌云、梅强(2014):《女性创业的现状与需求分析》,《软科学》,第4期。
7. 李树、陈刚(2012):《“关系”能否带来幸福?——来自中国农村的经验证据》,《中国农村经济》,第8期。
8. 梁漱溟(1987):《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
9. 马光荣、杨恩艳(2011):《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经济研究》,第3期。
10. 乔丹等(2017):《社会网络、信息获取与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采用——以甘肃省民勤县为例》,《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11. 齐小兵(2014):《社会资源的动员:以农民工企业家为个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12. 王超恩、刘庆(2015):《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创业融资方式选择》,《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版)》,第2期。
13. 许艳丽、郭达(2015):《近20年国外创业性别差异研究综述》,《妇女研究论丛》,第6期。
  14. 杨婵等(2017):《家庭结构与农民创业——基于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分析》,《中国工业经济》,第2期。
  15. 张玉利等(2008):《创业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
  16. 张峰等(2017):《体制内关系与创业》,《管理世界》,第4期。
  17. Ardichvili, A., Cardozo, R., Ray, S. (2003), A 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8(1):105-123.
  18. Arregle, J.L., Batjargal, B., Hitt, M.A., et al. (2015), Family Ties in Entrepreneurs' Social Networks and New Venture Growth.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9(2):313-344.
  19. Cassiman, B., Veugelers, R. (2006), In Search of Complementarity in Innovation Strategy: Internal R&D and Extern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Management Science*. 52(1):68-82.
  20. Casson, M., Giusta, M.D. (2007), Entrepreneurship and Social Capital: Analysing the Impact of Social Networks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from a Rational Action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mall Business Journal*. 25(3):220-244.
  21. Dahalan, N., Jaafar, M., Rosdi, S.A. (2013), Local Community Readiness in Entrepreneurship: Do Gender Differ in Searching Business Opportunity.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91:403-410.
  22. Karatepe, O.M., Kilic, H. (2007), Relationships of Supervisor Support and Conflicts in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with the Selected Job Outcomes of Frontline Employees. *Tourism Management*. 28(1):238-252.
  23. Meek, W.R., Pacheco, York, J.G. (2010), The Impact of Social Norms on Entrepreneurial Action: Evidence from the Environmental Entrepreneurship Context.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5(5):493-509.
  24. Moore, G. (1990),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Men's and Women's Personal Network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5):726-735.
  25. Powell, G.N., Eddleston, K.A. (2013), Linking Family-to-business Enrichment and Support to Entrepreneurial Success: Do Female and Male Entrepreneurs Experience Different Outcome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8(2):261-280.
  26. Schoar, A. (2010), The Divide between Subsistence and Transform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Policy and the Economy*. 10(1):57-81.
  27. Sun, Z., Hou, J., Li, J. (2017), The Multifaceted Rol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Asian Journal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25(1):168-183.
  28. Welter, F. (2011), Contextualizing Entrepreneurship—Conceptual Challenges and Ways Forward.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5(1):165-184.
  29. Zmud, R.W. (1984), An Examination of "Push-Pull" Theory Applied to Process Innovation in Knowledge Work. *Management Science*. 30(6):653-776.

(责任编辑:朱 犁)